

构建面向 21 世纪的中韩经贸关系

陈德华 秦春华

一、中韩经贸关系的现状

中韩两国地理毗邻,文化相近,历史上曾经有过紧密的经贸、文化往来。20 世纪后半叶,这种关系被中断 30 年之久。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两国间开始发展经贸合作关系。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1979-1984 年是中韩经贸关系发展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相互间贸易依存度很低,到 1984 年中韩双边贸易额占各自进出口贸易总额之比不到 1%。(2)1985-1991 年是中韩经贸关系初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直接贸易有了初步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投资也有了较大的发展,1989 年双方贸易额为 30.55 亿美元。韩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 2536.7 万美元。1991 年,双方贸易额猛增到 57.65 亿美元,同时韩国对华投资金额增至 1.41 亿美元。(3)1992 年至 1997 年,中韩经贸关系进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1992 年 8 月 24 日,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两国政府间还签订了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关于成立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联委会及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等,使双方经贸关系飞速发展。但这种发展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短暂冲击;(4)1997 年至今,经过金融危机的撞击之后,两国经贸关系逐步进入成熟成长阶段,合作开始向纵深发展(参见表 1、表 2)。

表 1 我国出口在主要市场上的份额

	对其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其对华进口在其全球进口中的比重(%)	
	1996 年	1998 年	1999 年 1-10 月	1996	1998
美国	17.7	21.6	22.0	17.0	15.2
日本	20.4	16.2	16.4	5.0	6.5
香港地区	21.8	21.1	19.0	3.4	3.7
德国	3.9	4.0	4.0	8.4	8.5
英国	2.1	2.5	2.5	5.7	5.2
韩国	5.0	3.4	3.9		2.8

说明:本表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技术处理。

资料来源:王雪坤:《2000 年我国外贸面临的形势及展望》,外经贸部政策研究室研究报告。

1. 双边贸易发展迅速。一个表现是贸易额增长迅速,1979 年双边贸易额仅 1900 万美元,1993 年达 108 亿美元,1997 年达 240.4 亿美元。1998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额有所回落。1999 年,双边贸易再度呈良好增长态势,全年双边贸易额达 250.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7%。2000 年 1 月至 3 月份中韩双边贸易额为 69.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9%。其中韩国对华出口 40.32 亿美元,自华进口 29.66 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40.1% 和 65.8%。第二个特征是两国贸易结构高度互补,中国对韩国出口大多是初级产品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主要有钢铁、煤炭、原油、纺织原料及其制品等

原料性产品和玉米、植物产品及药材等农副产品。其他大宗商品有化工原料、皮革制品、鞋类、饲料和机电设备等。韩国对中国出口主要是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主要有钢材、纺织原料、塑料及其制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皮革、纸张等。目前,韩国已成为中国第六大贸易对象国,中国成为韩国第三大贸易对象国。第三是贸易方式由间接贸易为主转变为直接贸易为主。1989 年,在两国贸易中,直接贸易的比重就占到 60%,近年来,贸易方式基本上已经全部转化为直接贸易。

表 2 对东亚地区主要市场的季度出口增长率(%)

	1998 年 1 季度	1998 年 2 季度	1998 年 3 季度	1998 年 4 季度	1999 年 1 季度	1999 年 2 季度	1999 年 3 季度
香港	15.3	-4.2	-14.6	-33.0	-36.2	-18.9	15.9
日本	-1.7	-6.6	-10.0	-7.4	0.03	5.5	12.3
韩国	-22.4	-35.4	-36.3	-25.8	14.1	15.0	29.1
东盟	-1.7	-13.8	-17.2	-1.0	2.5	5.6	26.0

资料来源:姚坚:《1999 年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及对 2000 年工作的思考》,载《经贸瞭望》,2000 (1)。

2. 韩国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其一是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从表 3 可以看出,1992 年韩国企业实际在华投资 1.2 亿美元,1993 年激增了两倍,1994 年又比 1993 年增长近一倍,达到 7.23 亿美元,1995 至 1997 年每年平均递增 50%,保持了快速发展的趋势。1998 年,由于对海外企业和投资项目注资的增加,韩国对外直接投资达 48 亿美元,增长 7%,中国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90 年代初韩国对中国投资主要是轻工业、纺织业、饮食业等中小企业,而最近对中国投资项目主要是石油化工、机械、电子、汽车、建材等大型企业,并迅速地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每一项投资的规模从 1991 年的 76 万美元,激增到 1996 年的 178 万美元。其二是投资方式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为主。1988 年以前,都是通过第三国的当地法人进行的间接投资,当时还没有直接投资的情况。1988 年以前,许可项目只有 4 件,而金额仅仅是 790 万美元,而到了 1997 年,直接投资就增长到 43.7 亿美元,增长了 500 多倍。其三是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建交后,纤维、服装、鞋、皮革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比重不断减少,相反,一些金属、机械装备、石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出现增加的趋势。

表 3 韩国在华投资情况(1992-1997 年)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批准项目(个)	650	1748	1849	1975	1895	1895
协议金额(亿美元)	417	15.57	18.06	29.98	42.37	21.81
实际到位(亿美元)	1.20	3.73	7.23	10.43	13.58	21.42

资料来源:杨文杰、李锴:《韩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发展与现状》,载《国际经济合作》,1999 (9)。

表4 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情况 单位: 百万美元

	项目许可基准		实际使用金额	
	投资额	投资件数	投资额	投资件数
1992	221.9	269	141.2	171
1993	622.3	629	262.2	376
1994	819.7	1066	630.7	81.5
1995	955.9	631	813	719
1996	1616.6	905	819.6	712
1997	488.0	323	437.0	297
合计	4724.4	3823	3104.1	2780

资料来源: 韩国贸易协会:《中国贸易及投资指南》,1995。韩国银行:《海外投资统计》,1996年、1997年上半年(1-6月份)。

3. 产业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两国现已成立了中韩产业合作委员会,共同商讨产业合作问题。这同时推动了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两国政府签定的“中韩科学技术协定”也为双方科技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40多年的发展,现阶段韩国在纺织、钢铁和轻工技术方面已趋成熟,部分产业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在基本设计、系统和软件开发等领域还有一定差距。而机械、石化和其他重工业还处在向外国学习的阶段。在高新技术,如精细化工、生物技术和自动化方面则仍属幼稚产业。而中国在航空航天、微电子技术及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发上具有一定优势,在某些领域居于世界前列,但还不能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这方面两国恰好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目前,双方正在就汽车、高清晰度彩电、核能、程控交换机等领域的深入合作进行具体协商。如大宇与一汽合作,投资15亿美元建立年产15万辆汽车和30万个汽车部件的合资企业;三星集团投资5000万美元在天津韩国工业园地建立录像机彩电生产厂;东洋水泥在东北投资235万美元建立年生产能力24万立方米的混凝土有限公司等。

4. 在劳务合作方面,韩国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现劳动力价格高昂、劳工短缺现象,而中国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低廉,因此两国在劳务合作方面存在广泛的前景。目前,韩国已经开放研修生方式的劳务市场。韩国许多企业希望雇佣中国员工,包括海员、技术人员和劳工等。截至1998年,两国共签订劳工合同3000余项,实际派出10万余人次。

此外,两国还在旅游、金融等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发展速度很快。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快速成长的阶段。这种合作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仍表现出强劲发展的势头,并且朝着纵深化、大型化方向前进。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尽管1997年许可项目有大幅下降,但实际到位金额反而有所上升,实际投资率(实际金额/协议金额)较高,这说明,在中韩经贸合作中,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主要是韩国的中小企业,大企业由于看好中韩合作的前景,受到影响不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韩经贸合作的发展潜力。

中韩经贸合作之所以发展迅速,主要是两国的比较利益驱动所致,两国的贸易依存度很高。1992年到1993年,韩国对外贸易增长总额的34.5%是依靠对中国贸易增长量实现的。从经济发展水平上讲,韩国经过战后30多年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门槛。经济规模(用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1996年已是美国的1/15,日本的1/7,中国的1/2,位居世界第11位,成为东北亚区域的重要经济大国和推动

本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人均GDP约为800美元,与韩国的差距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致使两国经济结构不同。韩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正在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劳动力相对短缺;而中国(整体)距离工业化还有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基本上还处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的阶段。因此,在两国经贸合作中,必然会形成产业在两国间转化的问题,也即已经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成功的“雁行模式”。而这也恰恰就是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依靠日本的产业转移而实现经济奇迹的原因所在。从目前中韩商品贸易和韩国对华投资的现状来看,这一点仍然在中韩经贸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尽管中韩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但仍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中韩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的障碍。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 两国贸易中,中方贸易逆差过大。自中韩建交后,韩国对华贸易一直呈顺差状态。1992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为768万美元,1993年,中方贸易逆差增加为12亿美元,1998年已高达近100亿美元。估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方贸易赤字将会有增无减。尽管顺差还是逆差并不能完全说明中韩贸易的全部,但中方长时间的逆差必然会引起双边贸易摩擦的产生。

2. 双边贸易中,中韩之间既有明显的互补性,同时又存在同一性。这一点在农产品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另外,中国向韩国出口商品大多采用“以廉取胜”、“以量取胜”的战术。据韩国产业研究院的调查分析,中国产品的价格平均指数比其他国家的价格平均指数低得多。此外,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依靠“以量取胜”,中国的大量廉价商品进入韩国,势必对其国内企业造成很大冲击,为此韩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中国商品的进口,对中国出口极为不利。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将明显减弱,而其他如质量、包装等非价格竞争力与其他国家相比,又处于劣势,这势必会造成出口下降。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予以详细的说明。

3. 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两国都采取了外向型的贸易战略,因此存在着相互争夺世界市场的诱因。同时,由于中韩在面对欧美市场时在许多产品方面都存在着相似性,尤其是韩国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迫切需要通过打开出口市场以摆脱困境,致使这种竞争性增强了。

4. 中国的投资环境还不尽人意。虽然中国在投资环境的改善方面,已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还不小。例如有些地方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港口和通讯、运输条件较差,能源、工业用水和原材料缺乏保障,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不高,企业管理不善,涉外法律不健全等等。另外,地方政策太多而且复杂,手续繁琐,这些都让一些大的韩国公司望而却步,不敢大胆来中国投资。外国人居住费用高,中国劳动力工资上涨等不利因素,也是韩国对华投资的障碍。

尽管中韩经贸关系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进一步发展中韩经贸合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1)从政治方面来说,两国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双方均抱有发展友好关系的共同愿望。同时,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2)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格局将长期存在。它是过去10多

年来促进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基本因素,预计今后仍将继续发挥作用。(3)经济全球化乃是大势所趋,世界正在紧密的结为一个经济整体,这在客观上提供了进一步发展中韩经贸关系的平台。下面,我们将结合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战略重点,集中探讨这一重要的富有挑战性的命题。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二、发展面向21世纪的中韩经贸关系

进入21世纪后,中韩经贸关系面临着一些全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实际上也构成了中国在下一世纪前5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具体来说,集中在三个方面。

1. 中国加入WTO

经过艰苦的努力,到2000年的上半年,中国终于完成了与美国和欧盟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双边贸易谈判,在此期间,业已完成了与WTO其他成员国的谈判,加入WTO,不仅是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大事,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战略的定位与实施,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说是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课题。

加入WTO后,中国与韩国将成为同一经济组织的成员国。这必将给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带来广阔的前景,但同时也有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仍旧采用两分法,即先分析有利的一面,再分析困难所在。

从有利的方面来看,中国加入WTO后,在WTO新规则规范下,随着两国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两国间开放市场的程度也随之得到了提高。由于不能够像以往那样通过过多的政府管制来对贸易进行限制,这必将促进资源在两国间的流通,也使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有效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有力地拓展两国间经贸合作的空间。这种扩展了的经济合作不仅会使两国产品的交换范围扩大,形成更大的市场规模,而且市场规模又必然会促使生产规模扩大和生产分工细化,推动生产力水平提高;同时,这种强烈依赖于比较优势的经济合作又必然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目前,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开放进程方面,两国的进展都比较迅速。从更深层次上讲,加入WTO对于中国来讲,还并不仅仅是一个对外经贸关系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其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恐怕要远远大于对外经贸合作的领域。中国方面,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将进一步加快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将在2005年将工业品平均进口关税水平降至10%,减少贸易限制,稳定人民币汇率,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发展与东亚各国的经济往来。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工业企业改革的步伐,积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将扩大吸引民间合作往来,促进中国全方位、多层次开放。中国政府将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吸引外资创造条件,政府积极鼓励外资以BOT(Build-Operate-Transfer)的方式进入。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将积极推行科技兴国战略,积极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特别对支持中国发展高科技合作的项目给予政策支持与保障,中国政府正在制定产业优惠政策,对地区优惠政策已经作出调整。

在韩国方面,韩国一贯倡导贸易自由化与贸易立国的政策。韩国的关税税率已经很低,特别是其在初级产品方面的税率远远低于制成品的税率,这将有利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在出口方面,韩国政府经常通过政策性融资控制银行贷款,以弹性利率来引导资金流向,为重点产业与企业提供银

行优惠贷款;以差别税率与关税减免等手段,抑制消费,扩大积累,鼓励出口,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当然韩国的这一系列政策均是有利于出口的政策,随着韩国与中国、日本的贸易增长,其贸易政策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韩国正在推进对中国、日本各国的直接投资,特别是韩国企业看好中国市场。韩国政府对海外企业业务实行低息贷款,提供支付保证及减免营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引导民间企业对在海外投资的的技术人员提供培训,并提供咨询;制定海外建设促进法等等。这些措施都将有力地推动中韩经贸合作的顺利开展。

尽管人们普遍看好中韩经贸合作的潜力和前景,但无庸讳言,在双边经贸合作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阻碍。其中,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中国对韩出口产品,尤其是农产品。

由于中韩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向韩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目前,农产品出口居于重要地位。2000年头三个月,中国对韩出口,从大类商品看,农林水产品所占的比重最大,总额达到5.09亿美元,占对韩出口的1/6强,其中农产品3.28亿美元,增长89.8%。目前,中国已成为韩国农产品的第二大进口国,仅次于美国,产品主要集中在玉米、大米、杂粮和蔬菜方面。由于中韩两国同处于东亚地区,农产品生产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而中国对韩农产品出口激增造成了对韩国国内市场的较大冲击。

韩国自加入WTO后,农业贸易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由于必须将非关税壁垒转换成关税,同时大幅度降低关税(在1995年以后10年内平均削减36%的关税,最低每项削减15%)以及设立最低市场准入制度等等,均对韩国国内农业生产造成冲击。因而韩国政府设计了一整套制度进行干预,对一部分竞争力脆弱产品进行适当的管理,即建立对国内农业可能造成冲击破坏的产品提高关税,当进口产品数量超过基准量时收取特别紧急关税的制度,对由于进口激增而带给国内市场巨大冲击的产品实行配额限制措施等针对受害产业的救济制度。另外,主要农产品只有获得农业部许可证才能进口,只有当国内农产品不能满足需要时,农业部才发放许可证。这反映了韩国对国内农业的保护政策。这些措施固然加大了韩国对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保护程度,但同时也造成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00年6月1日起由于韩国对自中国进口的大蒜征收315%的高额关税而引发的中韩贸易战。

事件发生后,两国贸易部门均认为对方违反了WTO原则,而本国的行为是合理的。我们认为,问题的实质其实并不在于是谁违反了WTO原则,因为当一方准备这样做的时候,作为WTO的成员国的韩国或者即将成为它的成员国的中国,一定已经设计出一个能够与WTO相关条款相适应的方案。这时候去争执哪一方违反WTO原则是没有意义的。问题的根本在于,这样的一种行为,完全是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那么,在谈判的时候,双方所要考虑的无非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判定继续执行这样一种策略的后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韩国有可能在谈判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原因在于,这一次,中国的报复性措施非常严厉。1999年韩国从中国进口大蒜只不过1529万美元,相反,韩国对中国出口的手机和聚乙烯加在一起已超过5亿美元。为了1529万美元,而失去5亿美元,对韩国来说似乎是“因小失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报复性措施,对韩国的手機、化工两个行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主要是这两个行业

目前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都比较深。韩国向中国出口的手持(包括车载)无线电话机 1997 年为 900 万美元,1998 年为 1400 万美元,1999 年为 4100 万美元。在韩国 1999 年出口的 190 万吨聚乙烯中,其中有 90 万吨是出口中国的。由于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高达 100 亿美元,这么大的逆差,贸易战若打响了,中国绝对占主动地位。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中国提出了一种“可置信的威胁”。

但是,对于中韩两国来说,贸易战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样做只能两败俱伤。事实上,“大蒜事件”在两国政府的努力下,最终也获得了圆满的解决。我们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案例,是试图说明,中国加入 WTO 后,对外开放程度将会越来越深,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也会越来越强。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面前,韩国面临着与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因而需要作出与以往不同的决策。由于中韩目前的经济合作已具有相当的基础,可以预见其前景是十分美好的。

2. “新经济”时代的来临

“新经济”正在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受到各国政府的密切关注。尽管对新经济是否存在还有这样那样的置疑,但是在“新经济”最典型的美国,已经实现了连续 110 个月的低通胀环境下的持续高速增长,这样的经济成就令任何一个国家为之侧目。看来,有充足的证据说明,21 世纪人类将进入新经济时代。

“新经济”是从美国开始发展起来的,但它一经产生,人们就开始认识到它对未来的重要意义。据统计,全球网络经济的年增长率为 63%。1999 年全球的产值为 5070 亿美元,创造了 230 万个就业机会。到 2001 年全球网络经济的产值将突破 1 万亿美元,到 2002 年电子商务贸易可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 10%~15%。无疑,这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从中韩两国的实际情况看,韩国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韩国目前的电脑利用率为 26%,互联网的利用率为 10.2%,居于亚洲领先水平。为了推进韩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韩国政府成立了由各界人士组成的“韩半岛信息化促进本部”,另外,韩国的“媒体之谷”也正在筹建之中,根据计划,现在已经开始基础建设。同时,韩国政府大力扶植发展风险产业。国家建立了风险产业发展基金,成立了风险产业的投资机构,并将用于支持中小风险产业发展的银行贷款额度进行了大幅提升。这些措施,有力的推动了韩国风险企业的发展。据最新资料显示,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韩国企业 2000 年一季度销售和收益形势一派大好。据韩国经济新闻社 2000 年 5 月 1 日调查,截至 5 月 1 日在市价总额前 100 位企业中有 42 家企业已编制出一季度销售额与收益实绩的概略财务报表,其中有 33 家是风险企业,它们一季度销售额与 1999 年同期相比平均增长 175%。其中,销售额增长率为最高的风险企业是“泰尔申”电子,从 1999 年的 136 亿韩元猛增到 2000 年的 1200 亿韩元,飙升了 782%;“波苏尔泰科”销售额增长率为 733%,均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目前,中韩之间的经贸往来主要还是通过传统方式进行,还没有明显的数据显示出电子商务在两国贸易间的影响。但作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无疑两国都要对“新经济”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另一方面,“新经济”在两国来说都还是新生事物,两国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合作空间是十分广阔的。由于在新技术的使用上具有后发优势,因而在两国目前开展的在汽车、电子等行业的合作上应当开始考虑 IT 技术的广泛应用。

3. 中国的西部开发

西部开发是中国进入 21 世纪最重大的战略性举措。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中国东部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工业结构和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现雏形,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日益突出,结构性的矛盾日益凸显。西部整体性的落后已经开始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换句话说,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西部的发展而单独得以实现。因此,当西部开发的号角开始吹响之际,也就意味着中国迈向全面现代化时代的开始。

事实上,西部开发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整体格局下进行的。西部开发的过程就是中国开放的过程。韩国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应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对韩国还是对中国来说,这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1) 西部开发意味着中国的全方位开放。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外向型的国家。经过经济特区、沿海、沿江、沿边的顺序,目前,没有获得开放的地区也许就剩下西部几个省市而已。也就是说,西部开发将为中国的全方位开放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在这个过程中,各主要经济国家必然会介入其中。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上,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1999 年 1 至 11 月,中西部地区 19 个省区市的进出口商品总值 210.8 亿美元,仅占全国的 6.5%;新批准合同外资金额 51.2 亿美元,仅占 1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40.6 亿美元,仅占 11%。事实上,这是一片还没有得到有效开发的处女地,其市场潜力是巨大的。在这个过程中,谁忽视了这个市场的存在,谁就有可能犯了一个大错误。同样,谁占据了制高点,谁就赢得了未来竞争的主动。换句话说,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韩国也将会面临着其他国家的强有力竞争。

(2) 西部开发是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举措。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比如,上海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西部许多贫困地区还在为解决温饱而努力。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现在到了进行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了。也就是说,要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发展更适于本地产业的产业。比如说,东部许多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开始面临劳动力价格提升的压力和自然资源匮乏的制约。它们的比较优势也相应开始转化为资本和技术。这时候,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而西部,恰恰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就成为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出发,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就有可能重现当年基于产业结构调整而出现的“东亚奇迹”。因此,韩国就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将本国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转移到中国西部。

(3) 西部开发是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重要部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实施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如今,对外贸易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 30%,已成为世界第九大贸易国,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位。然而,进入 1997 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趋缓。曾一度保持的 10% 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从 1998 年以后开始下降,只达到 7.8%。出口竞争力下降,对外贸易

大幅缩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防止世界性的大萧条的同时,也承担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损失。在对东南亚出口急剧萎缩和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的压力下,为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国只能采取政策转向,实现凯恩斯主义的扩大内需政策。从1999年的情况看,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率比1998年有了较大的提升。2000年一季度又比上年同期增长10%。西部开发将把这一政策引向纵深。

目前,在西部开发中,率先开始的是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家计划用20年左右的时间,在完成国道主干线建设任务的基础上,再建设8条连接东中西部的大通道,总计1.5万公里,技术标准是二级以上的高等级公路,其中高速公路3350公里,从而使西部地区的公路交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公路运输服务网络。同时,在“十五”期间,西部铁路基建投资将达1000亿元左右,到2005年,铁路总长达到1.8万公里,五年增加3000多公里。为了广泛吸引外资投向这些领域,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的3年内,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在西部地区再投资项目,凡外资比例超过25%的,均可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相应的待遇;允许在东部地区试点的开放领域和试点项目在西部地区同时进行试点;允许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西部地区承包、经营、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等等;这些措施都将有力的提高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规模 and 水平,吸引和促进外商到中西部进行投资。韩国应该抓住这一机遇,发挥官民结合的优势,从政府和民间两个渠道,加快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合作。同时,在这一合作过程中,应当注意

避免以往韩国在华企业投资广泛存在的投资规模偏小、投资方式简单、投资层次低等弊端,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水平。

农业,尤其是特色农业是西部的优势。西部地区土地面积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耕地面积占全国的1/4以上,草地面积占全国的3/5,水资源总量占全国的近一半,有着丰富的光照资源。棉花、烤烟、水果、花卉等产品品质好、产量高,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韩国由于国土狭小且山地居多,因而农产品品种少、数量小、价格高,难以满足国内需求,年度进口额约为60亿美元左右,中国在其中居第二位,约占13%(见表5)。据韩国农林部和进口商等有关方面反映,中国农产品现在的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价格低廉,在韩国很有竞争力。但是,由于韩国在农产品的进口上还存在着较高的进入壁垒,比如在水果进口的检疫方面的限制,因而中韩两国有必要在农产品问题上加强合作,使西部的农产品能够更有效的适应韩国市场的需求,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商品出口优势。

	1996	1997	1998
美国	3 018 605	2 177 404	1 671 649
中国	531 558	934 882	623 907
澳大利亚	456 224	455 281	434 941
印度	272 492	167 036	126 995
英国	210 319	215 673	122 839
印度尼西亚	164 668	155 513	112 757

资料来源: 外经贸部驻韩国使馆经商处:《韩国农产品调研报告》。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 陈永清)

(上接第103页)缺少资金,而在于合理制度安排的缺乏。这包括:法律法规的完整性和契约的有效性,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勇于冒险的制度文化以及政府的一定政策支持等。这决定了我国的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首先必须从以上几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3)一般而言,在投资项目进入成熟阶段以后,风险资本就要考虑退出问题,否则就无法形成资本的正常循环,风险投资的持续发展就得不到保证。风险资本的良性循环和周转客观上需要一个二板市场,以解决资本出口问题。但在我国现有资本市场尚未规范和有效的监管体系还未建立以前,二板市场在现阶段还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应积极发挥香港的创业板市场的作用,为国内的风险投资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条件。

2. 就完善我国融资制度而言,除了积极推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外,还应当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1)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与我国间接融资相比,直接融资的规模显得过小,二者之间的比例不协调状态已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了不利影响。就连政策层也承认间接融资比重过大是加剧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因而降低间接融资比重,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是必然的选择,但直接融资的迅速发展却又会对既有的间接融资格局造成过大冲击,这又决定了目前的状况下,两种融资比例的调整只有走一条渐进而稳健的道路;(2)直接融资中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关系。从发达国家企业的外部融资来源来看,直接融资中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比例差别不

大,甚至美国的直接融资中的债权融资比例远高于股权融资比例。从理论上说,债权融资的效率高于股权融资,这可由西方优秀企业的从内部集资、发行债券、发行股票的融资顺序所证明。但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所造成的融资结构失衡已给资本市场的发展乃至经济运行带来了一定的负效应,这理应成为我国融资制度改革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 周好文等:《中国融资制度改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3. 郭励弘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与风险投资》,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4. 钱颖一等:《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5. 刘曼红:《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6. 盛立军:《风险投资:操作、机制与策略》,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7. 许小松:《资本市场与高科技产业培育》,载《深交所年报1999》。
8. 成思危:《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载《管理世界》,2000(1)。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金融发展研究所博士生

西安 710061)

(责任编辑: 刘传江)